

学者笔谈

Scholastic Notes

(第十四辑)

徐 飞 ◎ 主编

坚守精神的向度

护卫大学的神圣与庄严

聆听心灵的声音

体察世界的本真

叩问工作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推崇学者应有的风骨与良知，清誉与道行

从庸常和平淡中开掘撷取独到发现



NLIC297092320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学者笔谈

Scholastic Notes

(第十四辑)

徐 飞 ○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自 2011 年 11 月起,上海交通大学主页上推出的“学者笔谈”专栏 39 篇文章集结而成。

该栏目的定位为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遗产与创新等主题,结合学者本人教学科研的主攻方向,直面世界科技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自“学者笔谈”专栏开创以来,无论是治学严谨、学术造诣深厚的老教授,还是富于创新精神、站在学科前沿的中壮年学术带头人,或是崭露头角、出类拔萃的青年教师;无论是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还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或上海社科新人;无论是科技精英还是教学名师,他们或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中挤出时间,或放弃节假日、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光,积极为这个栏目撰稿,将他们的治学心得、生活旨趣和人生感悟,以及对学生的期许和教诲娓娓道来,语言真挚平实,字里行间流淌出学者的真性情和为人为学、为师为医的真知灼见。非常适合广大读者朋友闲暇时阅读、体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者笔谈. 第 14 辑 / 徐飞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313-10110-5

I. ①学… II. ①徐…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6183 号

学 者 笔 谈

(第十四辑)

徐 飞 主 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960 mm 1/16 印张: 23 字数: 247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0110-5/C 定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4742979

主编：徐 飞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琳媛 卢思语 朱 敏 杜 欣

杨 静 闵建颖 张文清 郑 茂

顾伟民 顾 锋 谈 毅 曹 杰

序

自 2011 年 11 月起,学校主页以每周平均三篇的强度推出“学者笔谈”专栏。该栏目的定位是: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遗产与创新等主题,结合学者本人教学科研的主攻方向,直面世界科技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宗旨为回归学术本位,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全面展示交大的学术气象。栏目特别指出,淡化专业和学科,注重通识性和思想性,提倡思辨性和批判性,强调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彰显多元化、包容性和时代感。

寥寥数月,无论是治学严谨、学术造诣深厚的老教授,还是富于创新精神、站在学科前沿的中壮年学术带头人,或是崭露头角、出类拔萃的青年教师;无论是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还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或上海社科新人;无论是科技精英还是教学名师,他们或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中挤出时间,或放弃节假日,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光,积极为这个栏目撰稿,将他们的治学心得、生活旨趣和人生感悟,以及对学生的期许和教诲

娓娓道来,遂才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多卷本《学者笔谈》。

笔谈中学者们纵横捭阖、酌古量今,微言大义、议论风生。他们坚守精神的向度,为思想的独立和灵魂的高贵慷慨陈词,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踏实的治学态度达观放谈,为改进和加强教育教学质量和持续的学术精进建言献策。他们护卫大学的神圣与庄严,为普遍缺失的耻感、道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痛心疾首,为“去功利化”和力戒浮躁大声疾呼。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强烈感受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的一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六卷)尽管当下社会对教育界“失去灵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有种种诟病,但他们对“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执著追寻,仍令人对学者应有的风骨与良知、清誉与道行肃然起敬。

同时,他们对工作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叩问,当能触动读者去体察生活的本真和人生的厚重。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鞭辟入里的剖析,对未知世界和无字天书“Mother Nature”孜孜以求的探秘索隐,还能引发读者去领略思想的力量和探索的愉悦。此外,学者们善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常能从一些看似庸常或平淡无奇的事物和现象中,开掘撷取独到的发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中为数不少者有着乔布斯式“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自觉,有一种宝贵的自我对话和灵魂烛照的习惯,对媚俗、媚势和实用、功利保持起码的警醒。孔子曾言,“吾日三省吾身”。无独有偶,苏格拉底亦

坚称,“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而与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安提司泰尼,在回答“你从哲学中获得了什么”时如出一辙地答道:“同自己谈话的能力。”我想,正是这种听从心灵召唤的能力和自我反省检讨的精神,才使得学者的思想、情感有了往高尚和纯粹境界超拔的可能。

读着这些真挚平实的文字,仿佛他们就坐在读者面前,真诚温润,气定神闲,在一盏白炽灯的微光中,推心置腹,有感而发,侃侃而谈。情见乎辞,言关乎义,字里行间流淌出学者的真性情和为人、为学、为师为医的真知灼见。这些深刻而不失生动、清新质朴、充满思维张力的文字读来很是享受,非常愿意把这套书推荐给读者诸君。

是为序。

徐 飞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战略学教授、副校长

目 录

CONTENTS

- 001 序 徐 飞
- 001 陆 铭：中国研究的贡献
- 009 朱燕民：教学与科研并重
- 017 刘燕刚：科技管理创新发展的思考
- 023 张璐璐：我的岩土工程学之路
- 030 张伟民：信心和耐心
- 038 程蔚蔚：感悟宋庆龄的事业
- 043 张 瑞：热爱教学 享受教学
- 050 张永明：参加全国“两会”随感
- 057 赵 旭：21 世纪知识社会我国大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 065 何伟文：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花
- 075 张晓晶：构建多维创新型环境 加速生物医学工程发展
- 088 夏术阶：从临床中凝练并解决科学问题
- 096 麻志浩：教学是教师的第一责任
- 101 张玉瑜：读懂毛泽东
- 108 糜 军：班导师在当代大学生成长中的作用
- 116 王锡荣：人生三感悟
- 125 晏乃强：控制“灰霾”需要多方努力
- 136 伍民友：MOOC——未来教育的范本
- 144 吕旭龙：探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求善修行

- 154 徐冬根：以学生为中心 培养创新性法律人才
- 163 杨升荣：为大学立命
- 173 李金叶：中越瑶族民歌的传承与变迁
- 188 李志勇：共生——自然界、科学与社会
- 196 徐临江：读元典塑中华民族精神脊梁
- 204 阮恩茜：从竞技体育中汲取力量
- 213 何 奔：专家、学者与学问
- 221 周武忠：景观学：“3A”的哲学观
- 232 孙剑非：美好而短暂的大学四年
- 241 胡其图：课堂教学的改进与拓展
- 250 潘玉春：健康养殖势所必然
- 259 张 沁：乘着歌声的翅膀
- 268 张振家：做老师的本钱和做教授的资本
- 275 桑大伟：创业思维比创业行为更重要
- 285 王建新：激情在讲台上燃烧 价值在教学中展现
- 293 李敬来：美国大学漫谈
- 302 饶 宇：走适合自己的科研、教学、人才培养之路
- 310 林双君：我与天然产物生物合成研究
- 318 王金波：翻译漫谈——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说起
- 326 戴 晖：我的老师

陆 铭

【学者小传】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城乡和区域发展、劳动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研究课题。

2001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在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加拿大女王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法国里尔一大、香港科技大学等访问研究。已出版《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A New Economic Growth Engine for China*(主编之一)、《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合著)、《工资和就业的议价理论:对中国二元就业体制的效率考察》等多部专著;教育部“十五”规划重点教材《劳动经济学》、《劳动与人力资源经济学》和教育部“十一五”规划重点教材《微观经济学》(合著)。论文发表于*Worl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权威杂志。研究成果获得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二、三等奖、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获得的荣誉包括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2005年)、上海市领军人才(2009年)和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2010年)。

中国研究的贡献

我有一个奇谈怪论：学术需要贸易，国际学术交流就是国际贸易，而决定贸易模式的基本原理就是“比较优势”。

中国之独特性在于，这是一个“转型与发展中大国”，将“转型”、“发展”和“大”这三个特征集于一身的，可能独此一家，而且，这三个特征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相互嵌套的。

我认为中国研究还处在大量从事经验研究 (empirical study) 的时期。

我有一个奇谈怪论：学术需要贸易，国际学术交流就是国际贸易，而决定贸易模式的基本原理就是“比较优势”。我是经济学家，解释“比较优势”是我的职责，它的意思是，当一个国家样样都不如别国的时候，要扬长避短，选择相对来说更有优势地来做，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有竞争力。

当然，“比较优势”原理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对于个体，有两种情况不适用：一是已经具备了某种技术上的“绝对优势”的，不必再委屈自己的能力；二是不参与贸易的，完全可以仅仅出于兴趣来做事，这是更高的境界。经济学相信分工是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而且贸易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如果说学术是个例外，我想不出闭关自守会有利于学术的理由。当然，不是每一项研究都需要用

于贸易,说到底,兴趣还是第一位的。

接下来的话是对有志于从事中国研究的人们说的。我认为中国问题可以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如果要给一个定义的话,学术前沿在我看来就是未知且重要的问题。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仅以人口和经济的体量,世界上就不会有人认为中国问题不重要。但仅有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假设现有的西方主导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文献已经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那么,中国问题就只是现有理论的实验场。中国问题的前沿性在于,对它的理解远远不够。我不是说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恰恰相反,已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于中国(包括贸易与增长的关系),但是,还不够,而就这“不够”的那一部分,不就是前沿吗?

作为“转型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

近来我常说,中国之独特性在于,这是一个“转型与发展中大国”,将“转型”、“发展”和“大”这三个特征集于一身的,可能独此一家,而且,这三个特征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相互嵌套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地区间禀赋差异明显,各个地区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很强,如果地区之间实现有效的分工,大国优势对于中国的发展将极其重要;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至今在部分方面仍然存在政府干预的色彩,尤其是它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还远未市场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有很多理论问题都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价值。最近，我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的时候，围绕着发展、转型和大国三个方面，谈了中国研究的一般意义。

第一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即一个国家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从落后走向发达，这一块的研究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界还比较薄弱，因为主流经济学描述的主要是已经成熟的经济体，而不研究结构转换的问题。中国在经济的发展上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些可以推广的机制，比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这种问题是可以上升到一般理论的。

第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制度转型相对来说不是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但是现在一些新兴国家，包括苏联解体以后，很多国家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很多国家都存在一个从不完善市场向完善市场过渡的状态，那么如何实现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否具有一般的规律？比如说，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是什么关系？是先有经济的发展，再有制度的转型和政治民主化，还是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以制度转型和政治民主化为前提条件？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又比如，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教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制度（包括具体的政策）从一种状态转型到另一种状态，其触发机制是什么？等等。事实上，涉及制度转型的理论也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一些新见解的。

第三是大国治理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大的经济体如何实现有效的治理并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世

界上有很多很大的经济体,比如印度、欧洲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大的经济体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怎样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种结构最终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发展的绩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这只是举三个例子,实际上,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在中国非常重要,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里还不是很深入。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是可以基于本土的经验,为这些理论作出贡献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工作才刚刚起步,要真正形成成熟的理论,并且上升到一般性可以推广的理论,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中国特色”还是“中国模式”?

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思考两个概念的差别,即在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中,哪一些是属于过渡性的,哪一些是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比较稳定的。如果中国的很多结构性特征只是过渡性的,未来可能会归到人类已知的某种类型的制度上去,那么,中国现有的特色就没有那么大的理论意义了,剩下的,可能只有制度转型过程的理论意义。但是,假设过了二三十年以后,中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仍然具有与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治理结构,在政治或社会上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就很可能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问题在于,以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直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问题如果都能研究清楚,的确可以对全人类的智慧作出贡献。在没有研究清楚之前,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要谨慎。

我自己比较倾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等进入发达状态之后,中国的体制仍将保持一定的特色。这种特色所形成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就像在市场经济模式中,有英美体制与欧洲大陆体制的差异一样。即使在英美市场经济体制内部,英国、美国、加拿大都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在欧洲大陆体制内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有各自不同的体制。如果看到这一点,作为学者,就有必要进一步回答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特色,究竟有哪些是“发展”意义上的,最终会不复存在吗?而又有哪些特色是“比较体制”意义上的,在较长的时段内都会持续存在?

在保持那些“比较体制”意义上的特色的道路上,中国如何从当前的制度过渡到未来的制度?哪些条件或触发机制会推动这样的制度转型?有没有制度转型的时间表和急剧转型的转折点?

中国特色的道路(或模式)如果真有的话,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

如何看待中国研究的质量

中国学者应该能够基于中国的实践来提出一些大的理论构建,但在这个大的理论构建完成之前,对于这件事仍然还停留在“相信”的阶段,因为,当我们想了很多大问题之后,仍然会发现,对于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都还不清楚。也正因此,我认为中国研究还处在大量从事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的时期。

我不赞成用方法的复杂性来判断中国研究的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非常重要的前沿性的问题,有时候,将问题提出来就已经非

常重要,而由于中国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处在起步阶段,数据的积累非常不够,限制了一些方法的运用。而那些能够运用较为复杂的方法的问题,却往往已经是被学术界反复加以研究的问题,未必见得是前沿的。

举例来说,在教育经济学研究里,估计“教育的回报”简直就是一个各种“尖端武器”的实验田,在技术上复杂程度最高。但在中国,除了需要一般性地估计出教育的年数所带来的回报,也需要估计将政府的教育财政资源投向农村或城市,投向基础教育、技能培训或高等教育,哪种投资回报更高。而一个更为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则是,是否应该设计一种机制,来让政府投向欠发达地区(或农村)的教育资源成为一种可携带的资源,来让跨地区流动的人口(或进城农民)携带到其就业所在地,解决随迁子女在其父母工作地接受教育的问题。上述第二、第三两个问题已经涉及了城乡间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和地区之间的关系。

我不敢贸然在上述三个有关教育的问题之间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但我能确定的是,后两个问题的研究非常少,而且可能也正因为这样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的基础薄弱,数据积累不足,甚至根本没有相关的数据。从发表来说,第一个题目如果能进一步有边际上的贡献,可能能够发表到不错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去。对于后两个问题的研究,当然也有可能发表到国际学术期刊,但其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在短时期里,相应的研究可能还无法在方法上用到被国际学术界认为足够精确的方法。坦率地说,我不认为后两个问题(即使最终没有发表到国际一流期刊上去)就不是前沿研究。

在最近这些年来,中国研究的质量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在国

际上的发表数量和质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我还是认为,在国际发表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急不来的。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今天有关中国问题的国际发表是建立在大量之前的中文文献基础之上的,而今天发表的那些中文文献也是在为明天更好的国际发表打基础。换句话说,只要在当下的条件下做到了最好,推动了研究的前沿边界,这样的研究就是值得重视的。

在社会科学的大家庭里,越是与制度、历史这些因素相关的学科,越是偏“软科学”,而越是与制度、历史无关的学科,则越偏“硬科学”。以我所在的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为例,管理科学总体上来说偏硬,而经济学则偏软。在经济学内部,研究方法论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理论偏硬,而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则偏软。从发表上来说,越偏硬的学科,抽象掉了具体国家的背景,越容易在国际上交流和发表,实现“与国际接轨”。而偏软的学科,特别是重应用的研究,其重要性和研究的价值往往在特定的制度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才更能凸显出来。如果我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那么,就不妨对于中文文献再多一些重视,特别是真实刻画中国当代发展的那些文献。不管考核制度是否重视,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至少要求自己在研究中重视中文文献。

作为一个工作在中国的中国学者,对于那些重要的问题,就应该做。发表到哪是重要的,但我不认为这是唯一重要的。在这种问题上去争个理出来,没什么必要,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争辩一下,我就倔强地说,研究自己的祖国,别问我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必须的。